

# 視聽暴力：「九評」的生產、傳播及紅衛兵一代的記憶<sup>1</sup>

孫沛東

## 引言

作為最重要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sup>2</sup>之一，毛時代的媒體，尤其是紙媒和廣播，在建構和重塑中共革命傳統中有何作用？與蘇聯 1930s 的「大批判」對比，1960s 的中蘇論戰中的「九評」，對中共政黨文化有何影響？<sup>3</sup>在探討中國革命傳統的文化根基時，裴宜理強調中共在實現普通民眾理解、接受並擁護革命政權過程中，「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作用重大：自成立伊始，中共就對一系列象徵資源（宗教、儀式、修辭、著裝、戲劇和藝術等）進行戰略部署，旨在實現政治說服。<sup>4</sup>文革音景是從視聽文化角度研究文革。現有研究認為聲音記憶是毛時代視聽文化和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直接嵌入「紅衛兵一代」的日常言語和行為，關涉他們的認同及對世界的看法，影響至今。<sup>5</sup>其中，Clark 等的研究發現：文革時期的音樂將個體感官經驗與集體政治生活連接

---

<sup>1</sup>作者感謝哈佛大學燕京學社 2016-2017 年訪問學者專案的資助，感謝裴宜理、楊國斌、楊奎松、吳迪、金光耀和盧漢超等教授對文章初稿的指點，特別感謝哈燕圖書館卓越的文獻服務，文責自負。

<sup>2</sup>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27-186.

<sup>3</sup>馬龍閃：〈蘇聯 30 年代的“大批判”與聯共（布）政黨文化的形成〉，《俄羅斯學刊》，2013 年第 1 期，頁 68-78。

<sup>4</sup>Perry, E.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5.

<sup>5</sup>Mittler, B. (2012).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lark, P. (2012). *Youth Culture in China: From Red Guards to Netizens*. New York a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rk, P. (2008).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R. A. (2010). *Maoist model theatre: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Vol. 2). Brill.

Jones, A. F. (2014). "Quotation songs: Portable Media and the Maoist Pop Song," in Cook, A. C. (Ed.). (2014).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rk, P., Pang, L., & Tsai, T. (2016).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

起來，音樂被政治化，政治也被音樂化；音樂傳遞的意識形態資訊和政治價值，存在丟失和再生產現象，並呈現出色彩多樣，嘈雜的景象。<sup>6</sup>

文字入心，聲音入骨，記憶入命。首先，就文化形式而言，聲音文本具有單一性，而「九評」作為一個既有紙質文本，又有聲音文本的雙重文本，能夠協助我們從文字檔案和聲音檔案兩個維度，將文革音景研究上溯至 1963-1964 年，探究文革前 17 年，文革以及文革至今「紅衛兵一代」的文化記憶。其次，文革音景的完整故事不應只包括多樣化和噪音化，暴力化的面向卻長期被學界忽視。本研究試圖解碼「筆桿子」的紙質文本和「金嗓子」的廣播文本，分析兩種文本的組織化傳播，接受情境，及其對「紅衛兵一代」<sup>7</sup>的影響。以言辭鮮明尖利，富有攻擊性，邏輯簡單粗暴，情緒裹挾理性，理直氣壯，冷嘲熱諷，剛柔相濟為特徵的九評，<sup>8</sup>讓紅衛兵一代記憶深刻，至今在主流媒體和社交網站頻繁出現，<sup>9</sup>「九評體」與以大字報為代表的「文革體」有何聯繫？從音景演進的角度，如何佐證九評是文革的先聲？

---

<sup>6</sup> Clark, P., Pang, L., & Tsai, T. (2016).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1-8.

<sup>7</sup> 本文紅衛兵一代指 1945 年前後出生，在學期間（小學/中學/大學）經歷了「九評」，受影響最深的主要四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或一部分高中生中，1950 年代出生的學生因年齡問題，絕大部分到文革開始後還讀不大懂這類政論文章。

<sup>8</sup> 毛澤東 1949 年所寫〈別了，司徒雷登〉政論文，1951 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澤東親自修改），大抵是「九評體」前驅。文革前（包括「九評」寫作組）和文革中寫作組成員，以及為黨報寫社論的筆桿子們也深具「九評」文風。原北大教授錢理群（1939-）也承認九評對他影響巨大（參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2 年，頁 404-408。）另外，文革時期各地文革小報的很多主筆，如著名的四川重慶大學 815 戰鬥團的《815 戰報》主編周孜仁（1945-），「九評」對他們的文風也影響深重（參見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頁 8）。

<sup>9</sup> 2014 年黨報上的公開信和文章批評一些高校教師把持大學講臺影響青年人，不斷地抹黑中國，遣詞造句風格體現「九評體」。參見〈大學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遼寧日報》2014 年年 11 月 14 日，第 1 版；徐嵐：《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裡？》，新華社電：〈高校教師須守好三條底線 決不許教師在課堂發牢騷〉，《京華時報》2015 年 1 月 30 日第 7 版。

一些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批判文章，題目和內容沿用「九評體」。參見 Wu, G. (2016). New Qing History: Dispute, Dialog, and Influenc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23(1), 47-69.

何謂「九評」？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致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中蘇爭論因此進一步升級。同年7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確定撰寫系列中蘇論戰文章，由康生負責。根據毛的指示，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直接領導「中央反修領導小組」，陸續推出九篇評論：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連續發表了總稱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的九篇文章（簡稱「九評」），全面抨擊蘇共的內政外交政策。九評包括：〈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1963年9月6日）、〈關於史達林問題〉（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9月26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10月22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1月19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12月12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1964年2月4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雪夫修正主義〉（3月31日）和〈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7月14日）。<sup>10</sup>

九評因何而來？1958-1964年，中蘇爭論是中國外交政策中壓倒一切的問題。<sup>11</sup>儘管1961年中蘇關係有所緩解，但是1960年7月前蘇聯單方面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專家，同時大幅減少對華軍事及其他方面的物質援助。<sup>12</sup>與此同時，1949年之後歷次社會運動所累積的社會矛盾，尤其是1958年大躍進所產生的一系列嚴重後果，不但造成了大饑荒等嚴重的社會危機，同時導致中國領導層內部的結構性緊張。1960s中蘇同盟關係走向分裂不可逆轉。1962年隨著毛澤東提出「千

<sup>10</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59-516。

<sup>11</sup>麥克法誇爾 & 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 1949-1965年》，謝亮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505。

<sup>12</sup>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載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16-117。

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中共的內政外交進一步「左」轉，中蘇意識形態公開論戰不可避免。<sup>13</sup>

## 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資料來源主要有五個方面：1) 57 個紅衛兵一代口述史；2) 《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等黨媒報紙和地方誌（尤其是 1949 年以後中共出版的工業志中，有關紙質媒體出版和廣播電視的內容）；3) 北京、上海、廣東、陝西和黑龍江等省和直轄市的廣播電視檔案；4) 紅衛兵一代有關九評的日記、學習筆記和工作筆記等；5) 九評中蘇雙方主要參與者（撰寫人和翻譯等）和當事人的回憶錄及著作等。

1949 年中共建政後，視聽符號、群眾動員、社會控制和地緣政治想像，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繼續革命中緊密聯繫和互動的重大議題。從全球層面觀照 1962-1972 年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會發現中共使用現代性符號（修辭、宣傳、政治演講、群眾大會、集會、報紙跟紅衛兵小報等）和全球性事件（如中蘇論戰）塑造這一新的社會主義現代性，並訴諸於日常政治，從而將中國政治定位為世界範圍內革命鬥爭的典範。<sup>14</sup>1949-1966 年中共不斷重新編寫教科書，調整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成員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敘述，旨在適應遽變的國內外形勢，重新定位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sup>15</sup>討論九評的傳播、接受、影響

---

<sup>13</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第 5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152。

<sup>14</sup>Scarlett, Z. (2013). *China after the Sino-soviet Split: Maoist Politics, Global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prod1.hul.harvard.edu/docview/1353104911?accountid=11311>.

<sup>15</sup>餘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 年，頁 85-123。

和記憶，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九評至文革整個音景的聯繫與演變，而且能夠重新審視社會主義視聽文化在這種現代性敘述中的作用。

本文將中蘇論戰置於建國後國內政治的框架中，從傳媒視角關注九評傳播及其影響，主要分析作為記憶的檔案之一（as an archive of memory），九評紙質文本與語音文本的傳播效應及其影響有何不同？中共採用論戰文章、廣播和高音喇叭開啟「學習九評運動」意味著什麼？受眾的閱讀和收聽經歷如何將九評的文化內涵/價值傳遞至文革時期的紅衛兵論戰？紅衛兵一代中來自不同社會階層，身處不同地區，有著教育程度和性別的個體，對紙質文本和廣播文本中的哪些內容記憶深刻？文中還討論政治傳播、視聽記憶和暴力的聯繫。研究發現中共黨內頂級理論家起草，最高領導層親自修訂而成的九評文本，具有先天的傳播優勢，並通過無線廣播及黨內一流電臺播音員的聲音強化其影響力。從視聽記憶的角度，重新審視九評作為文革的先聲，如何從視聽暴力，思想暴力和對歷史的暴力三個層面，形塑紅衛兵一代。

### 文革先聲：九評的生產和傳播

報紙和廣播是毛時代普通民眾判斷政治走向的主要官方來源。中國當時在世界上比較孤立，有利於媒體更有效地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復旦大學紅衛兵司令安文江（1944-2013）感到兩報一刊充溢硫磺味的文章使校園籠罩在令人窒息的濃霧之中，他竭力從報紙和廣播中搜索政治方向：「那一段時間，我幾乎一字不漏地聆聽每晚的新聞廣播，天天逐字逐句地研讀兩報一刊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總想在字背後找到支撐靈魂的東西。」<sup>16</sup>哈爾濱居民盧叔從 1966 年 4 月

---

<sup>16</sup>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編：《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 年紀實》（第 5 集），北京：北嶽文藝出

16日《北京日報》上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三版文章，推測「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理由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也是先從報上搞起來的。<sup>17</sup>顯然，紙媒和廣播是當時官方和民間公認的傳遞政治資訊的媒介；開啟毛時代的政治運動，媒體往往是急先鋒。

同時，1921年中共立黨以來，尤其是1949年建政後，與蘇聯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親密盟友關係，是官方媒體極力宣傳的一個重要面向，如何在短時間內，迅速有效地向民眾傳達眼下的中蘇分歧和公開決裂的重大政治資訊？中共及其媒體面臨挑戰。北京小學生徐焰（1951-）當時既堅信中方有理，又感到內心彘扭，因為中蘇友誼「牢不可破」的宣傳深入人心，再加上從小閱讀了大量蘇聯文藝作品，對蘇聯文化有親和性，所以一下子難以接受蘇聯修正主義的新形象。<sup>18</sup>喜愛蘇聯文藝作品的武漢大學生徐海亮（1944-）在公開批判蘇共以後，內心衝突加劇，「要從內心深處活活地剝離出對蘇共以及對蘇俄文化的感情來。」<sup>19</sup>基於此，「筆桿子」與「金嗓子」緊密合作，實現九評的廣泛傳播和影響，同時進行深入的社會動員和政治說服，發展中共的現代性敘述。

### 「筆桿子」的九評：紙質文本的生產與傳播

中共論戰體濫觴於國共內戰時期（1927-1937年為第一階段，1945-1950年為第二階段）的廣播和紙媒。國民黨南京中央廣播電臺1928年建台，主要職能實行反

---

版社1989年，頁302。

<sup>17</sup>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14-15。

<sup>18</sup>《蘇聯總理談中蘇論戰：你們的“九評”太厲害了》，鳳凰衛視2011年2月24日《鳳凰大視野》，[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1\\_02/25/4852445\\_0.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1_02/25/4852445_0.shtml)。

<sup>19</sup>徐海亮：〈我的文革見聞——另一類學生與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522期，2006年8月23日，<http://www.cnd.org/CR/ZK06/cr356.gb.html>，2016年11月27日登入。

對中共的內戰宣傳。<sup>20</sup> 1940 年建台的中共延安廣播電臺後所播發的如「揭露國民黨中央社篡改中共發言人聲明的無恥行為」和「國民黨死硬派還有多少號召力」等廣播稿，佐證國共之間的論爭。<sup>21</sup> 1941 年創刊的《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傳達中共的一切政策：其社論均由中央領導及重要幹部執筆，並通過廣播傳遍中國；這些宣傳強調「政治家辦報」，「黨性第一」，報紙是「指導工作和教育群眾的武器」，黨「運用輿論反擊國民黨進攻」。<sup>22</sup>

1963 年夏，「中央反修領導小組」彙集黨內最高水準的理論家成立並進駐釣魚臺，其成員包括正副組長康生、吳冷西，以及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和吳江共七人，配多名助手及五個外文語種的翻譯班子。<sup>23</sup> 寫作組也得到兄弟單位，如中聯部和史學「反修組」等部門專業、及時的資料供給和智力支援。<sup>24</sup> 其工作程式是擬定題目，再分頭完成寫作綱要，每篇提綱經領導小組初步討論後，再由鄧小平親自到場審核敲定，然後寫成文章，由小組討論修改定稿。<sup>25</sup> 實際上，這些文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前，鄧也會在吳冷西，康生修改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sup>26</sup> 反復多次，再送毛澤東和其他幾位常委及有關中央領導同志審改，重要的文件最後經政治局討論通過。<sup>27</sup>

---

<sup>20</sup>汪學起：《第四戰線：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撥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8 年，頁 184。

<sup>21</sup>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延安(陝北)新華廣播電臺廣播稿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85 年，頁 1-5。

<sup>22</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 1983 年，頁 1-10。

<sup>23</sup>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19-320。

<sup>24</sup>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9 年，頁 208-210。

趙慶雲：〈中蘇論戰背景下的史學“反修組”初探〉，《中共黨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頁 45-54。

<sup>25</sup>吳江：〈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記略〉，《炎黃春秋》2005 年第 5 期，頁 46-48。

<sup>26</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頁 1805。

<sup>27</sup>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19。

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直接修改並領導九評。九評屢經多級多人多次修訂，如〈七評〉先後有十九稿，<sup>28</sup>〈八評〉有十三稿。<sup>29</sup>最為關鍵的是，毛在中南海多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並審閱定稿，並做增刪。<sup>30</sup>毛年譜上對〈一評〉、〈三評〉和〈六評〉無相關記載，<sup>31</sup>除〈四評〉無修改外，<sup>32</sup>其他五篇文章都由毛澤東最後審閱，並做出程度不同的修改。如：他先後三次審閱修改〈二評〉，並將標題改為〈關於史達林問題：二評蘇中中央的公開信〉，修改原句 100 多字，增加 600 餘分析文字。<sup>33</sup>討論〈五評〉，審閱定稿，並做增刪。<sup>34</sup>審閱〈七評〉第十八稿，在「當前最大的分裂主義者」部分加寫：「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是國內資產階級因素氾濫和增長起來的產物。」在「目前的公開論戰」部分最後一段的開頭加寫：「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是不怕論戰的，怕論戰的不是科學。」<sup>35</sup>這些句子短小精悍，鏗鏘有力，而且朗朗上口，不僅增強了論戰的氣勢，而且直接回應 1963 年 12 月蘇共寫信希望停止論戰的訴求。1964 年 3 月中旬，毛審閱〈八評〉，在文章開頭加了一長段話，闡明此評目的是「以比過去更清楚的語言，回答修正主義者。」3 月 22 日，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八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幾天後，毛再次

---

<sup>28</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311。

<sup>29</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326-327。

<sup>30</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281。

<sup>31</sup>1963 年 7 月鄧小平回復康生、吳冷西、喬冠華關於撰寫文章評論蘇共公開信的請示時，批“擬原則同意（寫好幾篇後可在研究）”，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頁 1767。

<sup>32</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269。

<sup>33</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259-260。

<sup>34</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281。

<sup>35</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311。

審閱並少量修改八評第十二稿。<sup>36</sup>而最為關鍵的〈九評〉，毛澤東更是從 1964 年 7 月 5 日起，幾次召開會議，逐段討論修改此文，毛修改了題目，對內容也做了小幅改動。12 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討論通過〈九評〉。<sup>37</sup>九評譯者李敦白的回憶，佐證毛本人對九評的重要參與和最終定調。<sup>38</sup>

紙媒、廣播和單行本，這些毛時代的組織化傳播管道，最大限度地覆蓋全國受眾，有助於實現有效傳播、社會動員和控制。九評文本定稿後，翌日登上《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等中共各級各地紙媒的頭版頭條，同時新華社、央廣和各地廣播電臺廣而播之。另外，人民出版社翌日印刷出版單行本，全國發行。<sup>39</sup>外文廣播和中文廣播同時播出，還推出各種語言的單行本和各種小冊子。<sup>40</sup>與大部頭政論文集相比，單行本攜帶方便，便於傳播，有利於在國內外普通民眾中普及九評。單行本的源頭大致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初民眾抗議活動中所使用的傳單，中共在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中也都使用傳單傳遞革命思想，進行群眾動員。

下文將從言語的力量和概念的啟迪兩方面，分析九評紙質文本的先天優勢，如何有利於其影響以及傳播。

---

<sup>36</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326-327。

<sup>37</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頁 370-371。

<sup>38</sup>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擔任外國專家的李敦白被抽調，親自參與了翻譯“九評”論戰文章，自感其機密程度遠勝於翻譯毛選。首先，選中的譯者都是政治清白者；進出位於新華社某隱秘辦公室的翻譯地點，由遮著窗簾的轎車接送；譯者不可走出指定區域，也不能告訴認識的人自己的工作；三餐由專人送入，不可進入公共食堂。如此保密的原因是原稿由撰寫者那裡直接送來，草稿翻譯過程中陸續收到中共中央領導人親筆修改意見或建議，通常毛澤東的意見一錘定音，甚至推翻重來。參見〔美〕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艾曼達·貝內特（Amanda Bennett）著，《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丁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頁 172。

<sup>39</sup>新華社：〈《關於史達林問題》出版〉，《人民日報》1963 年 9 月 14 日，第 1 版。

<sup>40</sup>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21。

大量使用軍事用語，表現出對革命暴力的崇拜。九評中有「戰爭」、「進攻」、「軍隊」、「戰鬥」等大量軍事語言，表明一種簡單粗暴的邏輯，說明中蘇論戰雙方只有對錯，好壞，革命與修正主義的區分。文革中，這種「革命的粗魯」首先被紅衛兵一代繼承、使用並推向極致。<sup>41</sup>

引用革命導師和俄國諺語，尖刻而雄辯；援引當時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的言論，針鋒相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評〉中轉引：列寧說過，「政治上採取誠實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採取欺騙態度，是軟弱的表現。」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總是採取誠實的態度，總是尊重事實的。只有政治上墮落了的人才靠說謊過活。事實是最雄辯的。事實是最好的見證人。<sup>42</sup>〈二評〉中轉引列寧引用俄國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鷹與雞〉諷刺修正主義者，「鷹有時比雞還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倍倍爾、盧森堡是「偉大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犯過錯誤，但他們始終是「鷹」，而修正主義者，則是「工人運動後院糞堆裡」的一群「雞」。<sup>43</sup>熟悉中國古典詩文的知識份子，這類比喻讓他們聯想到中國的文化典故，更能體會其中的妙處。〈二評〉發表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贊此文「意賅情摯，切理饜心，迴圈諷喻，拍案叫絕，」並抄錄一首唐人吳武陵借嘲山雀諷刺官僚詩。<sup>44</sup>「九評」撰寫過程中，毛澤東指示引用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的原話，點評批評他，因為「他講話最多，而且前後矛盾，邏輯混亂，語言粗野，有時甚至胡說八道，」所以批判他既要嚴肅辯論，又要抒情式嘲諷，做到剛柔相濟。<sup>45</sup>

援引中國古典詩文，輔以富有畫面感的文字，為論戰體增色不少。〈八評〉

<sup>41</sup>李遜 裴宜理：〈革命的粗野〉，《文學自由談》，1993年第4期，頁33-39。

<sup>42</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63。

<sup>43</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129。

<sup>44</sup>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9年，頁198。

<sup>45</sup>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9年，頁184。

寫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冒牌的社會主義是死亡了，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卻充滿著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邁進。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一定會克服一切困難和阻撓，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一直到贏得整個世界。」<sup>46</sup>表明中共無懼，甚至蔑視世界規模的「反華合唱隊」的批評和反對，堅持正統的社會主義的樂觀和豪邁。

以文中注和註腳的方式，呈現出學術論文般的嚴謹，增強其說服力。〈八評〉中馬恩列斯的專著仍舊採用文中注，但增加 46 條章節附註。<sup>47</sup>〈九評〉有 70 條注釋。<sup>48</sup>如〈七評〉除了所有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專著的引用採用文中注釋外，另有 21 條章節附註，其中的每一條蘇共言論引用，都像論文一樣作了章節附註，力證自己有理有據。<sup>49</sup>文章引用了蘇聯《真理報》、《紅旗報》和《共產黨人》三份蘇共核心報紙的社論、評論和編輯部文章，以及美國《新聞週刊》和英國《泰晤士報》的相關文章，借「美帝」「英帝」之口，證明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這些都給讀者製造出一種文中所呈現的材料切實可信，消息來源覆蓋面廣泛的印象。然而，中共後來承認「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sup>50</sup>

「九評」大量採用排比句、反問和設問句，咄咄逼人。「難道」有 47 處，如〈三評〉中

難道有那麼一個像聲明所說的，在國際機會主義的變種——現代修正主義「

<sup>46</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 445。

<sup>47</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頁 366-368。

<sup>48</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頁 64-67。

<sup>49</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頁 120-121。

<sup>50</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頁 1-61。

理論」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難道有那麼一個像聲明所說的，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難道有那麼一個像聲明所說的，進行著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破壞工作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難道有那麼一個像聲明所說的，進行著有害於一切愛好和平力量和國家的團結的活動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難道有那麼一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花了幾十億美元豢養的「社會主義國家」嗎？<sup>51</sup>

使用大量的挑釁語言，富有戰鬥氣息，營造出排山倒海的氣勢。

隨著中蘇分歧和論戰的升級，官僚主義、特權階層、兩種路線、階級鬥爭等詞彙和概念開始武裝民眾的頭腦。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毛澤東談國內幹部作風問題，曾多次使用「死官僚主義分子」或「死官僚主義者」，此時，這些幹部仍是自己人，與他們的矛盾仍是人民內部矛盾；<sup>52</sup>1963年9月〈三評〉中拋出「官僚資產階級」，指出南斯拉夫的官僚資產階級依附於美帝國主義，屬於買辦資產階級，<sup>53</sup>這已升級為敵我矛盾。〈九評〉拋出「特權階層」概念，認為「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sup>54</sup>

從關鍵字詞頻來看，隨著論戰的逐步推進，中共對蘇聯的定性也越來越清晰。除去附錄，九評每篇文章平均2萬2千多字，其中最長的第九評，字數達到3萬3千多。合起來203103字。「修正主義」出現400次，「路線」222次，「無產階級專政」出現155次，「階級鬥爭」79次，「修正主義者」63次，「特權階層」21次，「騙」字的詞頻達到54次，其中「欺騙」33次，

<sup>51</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154。

<sup>52</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499。

<sup>53</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189。

<sup>54</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470。

「幌子」一詞 10 次。上述關鍵詞表明在這場論戰中，階級鬥爭日益成為外交和內政核心問題。與二十世紀「革命」話語頻繁出現的現象一樣，上述革命話語的密集出現和大幅增長，對應的是敵我矛盾的深度和革命形勢的嚴峻程度。<sup>55</sup>

上文簡要分析了九評紙質文本的形式和內容特點。紙質文本的傳播及其影響已然發酵，而經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齊越、夏青等人朗讀後，「簡直轟動中華大地的城鎮鄉村，那抑揚頓挫令人亢奮的聲音被很多人模仿。」<sup>56</sup>

### 「金嗓子」的九評：廣播文本的生產與傳播

無線廣播作為一項新興媒體，於 1920 年代引入中國。國民黨認為廣播是海陸空之外的「第四條戰線」，所以 1928 年國民黨中央政府南京中央廣播電臺成立，主要用於反對中共的內戰宣傳，是國民政府發動的軍事和文化圍剿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 1937 年抗戰爆發後，「宣傳抗戰意志，提高抗敵精神，爭取友邦同情。」<sup>57</sup> 1940 年底建台的中共延安新華廣播電臺，說理與攻心並用，「運動輿論反擊國民黨進攻」，一直擔負分化和瓦解敵人的職能。該台「是黨的喉舌，是團結人民，宣傳真理，打擊敵人的武器」，與當時的革命報刊一起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傳媒系統；<sup>58</sup> 戰時廣播消息製作和播報，比報紙和其他印刷品程式簡單，電波傳送消息也不受紙媒發行限制。傳播前線戰況和時事新聞比報紙更神速和有穿透力。<sup>59</sup>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毛澤東和朱德多次發表有關

<sup>55</sup>金觀濤 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2008 年，頁 384-390。

<sup>56</sup>王娜 于嘉主編：《當代北京廣播史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3 年，頁 69-70。

<sup>57</sup>汪學起：《第四戰線：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撥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8 年，頁 184。

<sup>58</sup>趙玉明：〈紀念中國人民廣播事業創建六十周年〉，《新聞戰線》2001 年第 1 期，頁 66-69。

<sup>59</sup>鄭萍：〈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宣傳作用的傳播學解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頁 158-161。

時局和新年祝詞等廣播講話，鼓舞士氣，分化瓦解敵軍。<sup>60</sup>《對國民黨軍廣播》節目，以國民黨中上級軍官為主要聽眾，<sup>61</sup>國民黨被俘將領發現「中共的政治攻勢真比張良的楚歌還厲害。」<sup>62</sup>

中共建政初期就開始建設比較完整的廣播收音管道，旨在傳達中國在國內外的「聲音主權」。毛澤東歷來重視發展廣播，對建立和發展農村廣播，加強廣播電力及確保安全播音，多次做出指示。1955年，毛指示新華社向世界各地派駐記者，「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sup>63</sup>同年，國務院令廣播事業局免費撥出1500部收音機，地方政府負責配備收音員和維護收音機，在雲南、貴州、西康、甘肅、青海、新疆、廣西、海南和內蒙古自治區建立收音站，旨在「加強對邊遠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政策時事宣傳」，同時預防惡劣天氣對農業和畜牧業的損害，也部分地滿足農民對文化娛樂的要求。<sup>64</sup>

1960年代，遍佈中國城鄉的有線廣播和廠礦企業的廣播站構成了全球最大的傳播網路。1958年北京電視臺開播後，全國主要大城市的電視臺也相繼開播。因價格昂貴，耗電量大，難以普及，當時城鄉主要靠收音機來獲取資訊。每天清晨六點半的「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節目」，每晚八點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通過空中電波向全世界發佈著中國的資訊。1960年代起中國農村普及有線廣播，每個縣有廣播站，每個公社有廣播放大站，沒有電就用柴油機

---

<sup>60</sup>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頁100。

<sup>61</sup>郭鎮之：〈延安（陝北）台的“對國民黨軍廣播”〉，《新聞與傳播研究》1983年第5期，頁103-116。

<sup>62</sup>新華社：〈攻心戰〉，《解放軍報》1962年12月14日，第3版。

<sup>63</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頁182。

<sup>64</sup>國務院法規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彙編編輯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彙編 1954年9月-1955年6月》（總編號：1），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1956年版，頁465。

發電。多半農戶花一兩元買一個舌簧喇叭，細鐵絲拉根線就可以收聽廣播。

<sup>65</sup>1964年「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後，位於寧夏某偏僻小村的勞改農場的作息制度開始由場部廣播指揮。<sup>66</sup>到1965年，毛澤東又專門為中央廣播事業局題詞：「努力辦好廣播，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sup>67</sup>軍隊廣播的普及程度也不例外。劉江華（1953-）1974-1978年在閩北山區某部隊擔任文書，他記得營區裝有高音喇叭，重要的廣播都是通過這些高音喇叭播放。平時早上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節目，偶爾也會播放一些當時的歌曲。部隊的起床號和熄燈號也由喇叭播放。<sup>68</sup>

1949年-1978年，廣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起到重要的政治動員作用，尤其在識字率較低的中國廣大農村，作用很大。1978年以前的廣播節目，大致分為新聞性廣播、教育性廣播（對農村、民兵、青少年和知青等的政治教育、科技教育和文化教育和教學）、文藝性廣播（音樂、革命歌曲、革命現代戲等）和服務性廣播（天氣預報）。<sup>69</sup>在陝西省寶雞市「明星旅社店員看來：廣播上都是些真人真事，我們每天輪流去聽，聽了回來向大家宣傳，因為我們不識字，聽了廣播就等於把報看了。龍泉巷、漢中路等地方群眾都要求裝喇叭。」<sup>70</sup>1963年央廣播送雷鋒和王進喜的講話錄音，客觀上推動了全國範圍內學習雷鋒和王

---

<sup>65</sup>1962年就讀北大的張曼平，文革中曾在北大“井岡山”廣播台擔任機務一年多，用大喇叭打派仗，做知青時曾在山西某縣城有線廣播站擔任八年機務。引自筆者對張曼平的微信訪談，青島-上海，2016年8月17日。

<sup>66</sup>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頁154。

<sup>67</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頁220。

<sup>68</sup>劉江華：〈毛主席逝世那年那月那日的記憶〉，微信公眾號“劉江華”，[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lwNTMyMzgwNw==&mid=2247484957&idx=1&sn=b14c9a4d58a4c998ae2862ff8ab6fd78&scene=2&srcid=0909wOgujQoDCPdPTkA278XB&pass\\_ticket=E8rYqsZc2kXN4lMYWH8YE7r7tJfZ8rQQj5WXlpK5DYdH7h8LXGiaUTyRN7cGqFMY#rd,2016-09-0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lwNTMyMzgwNw==&mid=2247484957&idx=1&sn=b14c9a4d58a4c998ae2862ff8ab6fd78&scene=2&srcid=0909wOgujQoDCPdPTkA278XB&pass_ticket=E8rYqsZc2kXN4lMYWH8YE7r7tJfZ8rQQj5WXlpK5DYdH7h8LXGiaUTyRN7cGqFMY#rd,2016-09-09)的登入。

<sup>69</sup>彭光乾 趙瑞軒主編：《陝西省寶雞市廣播電視志》，寶雞：寶雞市廣播電視局1986年，頁28-54。

<sup>70</sup>彭光乾 趙瑞軒主編：《陝西省寶雞市廣播電視志》，寶雞：寶雞市廣播電視局1986年，頁141。

進喜的運動。播出後，央廣收到大量聽眾來信稱說王進喜精神「極大地鼓舞了他們，他們決心學習王進喜戰勝困難的大無畏革命精神。」<sup>71</sup>

廣播媒體是以聲音傳送資訊，播音員對資訊的播送過程是一個創造性的再生產過程，包含播音員自己的理解和情感的「動之以情式」廣播，遠比「曉之以理式」更能觸動並感染聽眾，達到理想的政治傳播效果。中共強調新聞播音工作的特殊性，播音員必須歷史清白，政治可靠，具有一定政治覺悟和政策水準，因此，自延安時期至今，政治標準是選拔播音員的第一標準。<sup>72</sup>1952年中央廣播事業局召開的全國廣播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每個播音員都應是人民的喉舌，播音員不是傳聲筒，應是有豐富的政治情感和藝術修養的宣傳鼓動家，要使自己廣播的一言一句都深深打動人心。」<sup>73</sup>正是出於對黨和國家的深厚感情，齊越等「用聲音傳達黨的聲音，表達人民的心聲。」他用聲音重塑了雷鋒、焦裕祿和王進喜等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把他們的精神播向千萬人心間。」<sup>74</sup>播音中的情感動員是「情感工作」，是中共對民眾進行心理管控所採取的一種有意識的策略。<sup>75</sup>這種做法植根於中國傳統誦讀藝術，朗誦水準對審美藝術和文本傳播效果十分重要。<sup>76</sup>

---

<sup>71</sup>1963年3月5日，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發表，學習雷鋒的熱潮很快席捲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1961年雷鋒在遼寧省實驗學校一次講話的錄音，這也是他留下的唯一聲音。雷鋒的講話是關於當年在抗洪搶險中，冒雨連續戰鬥三天，生病，沒有吃飯的情況下，仍舊不顧勸阻，堅持參加抗洪搶險戰鬥的故事。而1964年鐵人王進喜在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期間的講話錄音，詳細講述1960年他初到大慶油田，如何克服困難打出第一口井的故事。參見王娜 于嘉主編：《當代北京廣播史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頁67-69。

<sup>72</sup>祝捷：《中國播音主持評價標準體系發展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3年，頁91。

<sup>73</sup>祝捷：《中國播音主持評價標準體系發展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3年，頁93-94。

<sup>74</sup>齊越：〈獻給祖國的聲音〉，《人民日報》1989年10月7日，第1版。

<sup>75</sup>Perry, E. (2002).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7(2), 111-128.

<sup>76</sup>《宋史·王沔傳》記載：“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王沔主持貢舉時，因善讀，經他讀過的試卷，無不大為增色，當時文人士子都希望自己的試卷有幸被王沔朗讀。參見《中華全二十六史》編委會編譯：《白話二十四史·宋史·王沔傳》（第6冊），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年，頁5338。

1960年代，尤其是文革前，普通播音隊伍的人員配備及其教育水準相對良好。1960年代中共開始對播音員進行系統的科班培訓。1960年秋天北京廣播學院開設首屆播音班，邀請夏青、林田、齊越等老播音員和侯寶林等老藝術家傳授語言藝術，央廣播音部第三代播音員的業務骨幹鐵成、紅雲等都是該班學員，之後都成為精英播音員。<sup>77</sup>又以陝西省寶雞市電臺為例，1961年該台和市報分設以後，至1963年，編輯記者增加至9人，其中大學文化程度的2人，高中程度的5人，初中2人，年齡最大30歲。<sup>78</sup>

以夏青和齊越為代表，擔綱播送九評的央廣第一代最具實力的播音員的聲音魔力，對九評的傳播和影響居功甚偉。夏青播音的傳播魅力被譽為「祖國的形像」，「其播音之雄渾、內容之深刻、邏輯之嚴密、分寸之恰當、聲音之震撼，至今仍留在聽眾的記憶中。」<sup>79</sup>以下著重分析九評語音文本，解讀語音，有助於更好地理解語音和記憶之間的聯接。<sup>80</sup>

除選用最好的播音員擔綱，中央廣播事業局組織九評播音組集體學習討論具體的演播技術。播音組成員開會討論廣播稿，梅益局長也參加；大家一起分析稿子，具體討論每一段的演播態度，不能聲嘶力竭對罵，而是要講道理，以理服人，有理有力有節；明確標點符號的停頓原則，頓號停頓一秒多一點，逗

---

“三分詩，七分讀耳”的典故說明同樣的道理。宋代周密所著《齊東野語》記載：有人將詩歌于蘇軾品評，後者給出十分。作者很高興，蘇軾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意即詩作不佳，只得三分，而朗誦甚佳，可得七分。參見周密著 張黎陽選注：《齊東野語》，北京市：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年，頁 1232-1308。

<sup>77</sup>呂大渝：《走近往事：一位元共和國第一代女電視播音員的自述》，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1999年，頁 144-146。

<sup>78</sup>彭光乾 趙瑞軒主編：《陝西省寶雞市廣播電視志》，寶雞：寶雞市廣播電視局 1986年，頁 118。

<sup>79</sup>新華社：〈著名播音藝術家夏青逝世〉，《人民日報》2004年7月31日，第4版。

<sup>80</sup>語音驅動型記憶（Voice motivated memory）有望為記憶研究和語音社會學提供分析概念、工具和方法論。參見 Istvandity, L. (2014). Musically motivat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nd the lifetime soundtrack. *Unpublished PhD thesis, Griffith University*.iv.

號停一秒半，句號停兩秒。<sup>81</sup>自延安新華廣播開播以來，中共宣傳部門創立播音制度，重視播音技術和宣傳技巧。新華總社語言廣播部出臺諸多管理細則，規範播音技術，強調播音員改進技術。<sup>82</sup>解放戰爭中，「記錄新聞」集時事新聞、解放區消息和評論三者要點，慢速播音，突破收音機不多，收音環境不佳限制，實現在地方報刊轉載，黑板報和人群內二次傳播。<sup>83</sup>從〈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廣播稿原稿，可見播音員為準確播音所做的種種標記，有關語氣、語調、重音等細節處理。<sup>84</sup>

以下以播音中出乎尋常的長停頓，說明九評播音效果。〈七評〉錄製中，夏青採用長時間停頓，產生強有力的傳播效果：「列寧說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如果不同 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 密切聯繫起來 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 那麼今天 反對帝國主義 和新老殖民主義 同新殖民主義辯護士的鬥爭 密切聯繫起來 不管帝國主義怎樣偽裝 怎樣掙扎...」夏青在省略號後大停頓，同事正要關閘，以便夏青修改，結果他開始繼續播音。「他一環扣一環、一句扣一句、一層扣一層，緊湊而富有層次，我們都可以鮮明地體驗到。」<sup>85</sup>播出後，效果極好。停頓成功地調動了聽眾的期待，因此停頓之後的內容便字字入耳，被訪者黃以平（1947-）說：「九評的具體內容忘記了，但當時聽了廣播感受到帝修反都來和中國鬥，形式嚴峻，心情沉重，更立志要好好幹革命。尤其是夏青那個緩慢而

<sup>81</sup>《蘇聯總理談中蘇論戰：你們的“九評”太厲害了》，鳳凰衛視 2011 年 2 月 24 日《鳳凰大視野》，[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1\\_02/25/4852445\\_0.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1_02/25/4852445_0.shtml)。

<sup>82</sup>如〈新華總社語言廣播部暫行工作細則〉，〈XIVCR 陝北工作階段的簡單總結〉，〈對目前改進語言廣播的幾點意見〉，以及〈口播經驗〉和〈播音經驗〉。參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研究室 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解放區廣播歷史資料選編：1940-1949》，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85 年，頁 119-133。

<sup>83</sup>〈介紹 XNCN〉，《解放日報》1945 年 10 月 25 日，第 4 版。

<sup>84</sup>劉佩 王明亮：〈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在解放戰爭中的宣傳技巧〉，《中國記者》2012 年第 7 期，頁 92-93。

<sup>85</sup>方明與夏青在播音室共用一個話筒，主播若出錯，守閘者扳開暫停。方明當年負責守閘。參見央視國際：「東方之子」--夏青(2004 年 08 月 18 日 15:51)<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40818/101904.shtml>，2016 年 8 月 16 日載入。

沉的節奏，不同以往，都是告訴我們情勢，都是將戰書打進我們心裡。」<sup>86</sup>網友也認為夏青是播音大師：「他播音時的莊重、沉穩讓人肅然起敬；他播音時氣息的運用，對「意群」（meaning group）、斷句、抑揚頓挫的處理可以說無可挑剔；他渾厚、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令人傾倒，聽他播音應該說是一種享受。」即便中蘇論戰時他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但「當時我能傻乎乎地、一動不動地把夏青播的長達數小時的論戰文章從頭聽到尾。」<sup>87</sup>

被譽為「黨的聲音，是祖國的聲音，是人民的聲音」的夏青等播音員在毛時代享有政治殊榮。能夠參與這麼重要的廣播，對播音員而言，首先是榮耀，其次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光榮任務。<sup>88</sup>九評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外播出後，在聽眾中引起巨大反響。〈五評〉播出後，周恩來、鄧小平和陳毅親自到廣播事業局，接見所有九評播音組工作人員，〈九評〉播出後，周恩來總理專門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招待夏青和相關工作人員。<sup>89</sup>

從國際來看，集權體制一貫重視「功勳播音員」在政治宣傳和動員中的作用。二戰時期的蘇聯，卡斯楚時代的古巴，胡志明時代的越南北方，毛時代的中國，以及當今北朝鮮皆如此，旁證語音在政治宣傳，社會動員和控制中的特殊力量。二戰時期的空中電波戰被概括為「兵馬未動，廣播先行」。<sup>90</sup> 二戰中蘇聯「功勳播音員」尤里·列維坦（Iurii Borisovich Levitan, 1914-1983）在希特勒的暗殺名單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史達林。希特勒曾揚言在攻下莫斯科後割下他

---

<sup>86</sup>引自筆者對黃以平的微信訪談，北京-上海，2016年8月17日。

<sup>87</sup>〈夏青：用聲音記錄世界的播音藝術家〉，人民網，2004年07月28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U-c/621075.htm>，2016年9月12日登入。

<sup>88</sup>王娜 于嘉主編：《當代北京廣播史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3年，頁70。

<sup>89</sup>葛蘭：〈我眼中的夏青〉，《新聞戰線》1998年第12期，頁40-41。

<sup>90</sup>王緋編著：《傳播之路：資訊的傳播》，濟南出版社，1992年，第73-77頁。

的舌頭。<sup>91</sup>朝鮮首席新聞女主播李春姬（1943-）播送朝鮮中央領導人的所有重要活動報導和朝鮮政府的重要聲明。國家配給她高雅住宅、高級轎車及專門司機。她播音時精神飽滿，莊重嚴肅，鏗鏘有力，朝鮮媒體形容她「能讓敵人肝膽俱裂」，是「讓敵人膽戰心驚的戰士。」<sup>92</sup>

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半身畫像成為電視播音員「頭像」。政治徹底浸潤社會主義聽覺文化空間，來自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重要資訊被投放進民眾的日常聽覺消費中，從而形成一種「全音景」（total soundscape），來自政治中心的語音觸及並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sup>93</sup>台標和標誌音樂過後，螢幕上是毛主席的半身畫像，配樂《東方紅》，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便不再「露臉」，只播「畫外音」，形同電臺播音員。<sup>94</sup>

## 兩種文本的生產和傳播的比較

九評紙質文本與廣播文本兩種載體，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傳播有何不同影響？文本是一種政治武器。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陸媒體黨媒獨大，沒有競爭，上述兩種文本都是國家自上而下所進行的一種「感覺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sup>95</sup>其中，紙質文本相對間接，受眾需有一定受教育程度，而且需要通過想像力，才能獲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試圖通過文本傳遞的資訊。同時，它比廣播文本具有更多的複

---

<sup>91</sup>程曼麗 喬雲霞主編：《新聞傳播學辭典》，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162頁。

<sup>92</sup>〈朝鮮鏗鏘主播李春姬〉，《炎黃世界》2012年第2期，頁52-53。

<sup>93</sup> Huang, N. (2013). Listening to films: Politics of the auditory in 1970s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7(3), 187-206.

<sup>94</sup>呂大渝：《走近往事：一位元共和國第一代女電視播音員的自述》，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頁194。

<sup>95</sup>感覺的分配指在某個時間節點上建立具有排他性的共同點，決定空間，時間和人類的活動形式，明確個體的參與方式。參見 Rancière, J. (2004).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12-13.

雜性和不透明性，承載著更多複雜的歷史和文化負累。對文革小說的研究表明，語言的字面意義和深層含義這種「不透明性」會給革命敘事帶來問題。<sup>96</sup>對在寧夏某勞改農場改造的勞改犯而言，從報紙和廣播這些傳播媒介中傳來的國家大事，「就象一連串象形文字，一連串符號，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從那些曲裡拐彎的筆劃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徑。」「紅頭文件」對於住在荒僻之地的局外人而言，註定是不可理解的。<sup>97</sup>

而廣播則是毛時代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國家以聲音形式深度介入民眾的私人空間，能夠更為直接地宣傳中共的意識形態，民眾只要收聽即可，教育程度和識字水準的高低不會對傳播力度和效度影響很大。儘管讀報組、電影流動放映隊、劇團下鄉巡迴演出等文化活動，有益於黨和國家在農村實施宣傳和教育。但上述文化活動都要求社員在同一時間，集合到一定的地點去閱讀和觀看。而農村的有線廣播，卻提供了比較方便的條件，有些社員認為「別看喇叭小，國家大事由它來指導。一聽喇叭叫，心明眼亮勁頭高。」<sup>98</sup>與 1970 年代民眾收聽電影一樣，廣播不但「創造出一種更加廣泛而平等的進入社會主義視覺文化的象徵秩序的幻覺，」<sup>99</sup>而且，以一種不容思考，不容置疑的佔領性，通過聽覺系統形塑社會政治。

總之，毛澤東的媒體觀強調政治功能和階級屬性，強調媒體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武器，是聯繫、動員群眾，指導革命和建設的政治工具。<sup>100</sup>

---

<sup>96</sup>Tian, X. (2016). Hao Ra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ojas, C., Bachner, A.,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6-371.

<sup>97</sup>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5 年，頁 76。

<sup>98</sup> 英楠：〈社員歡迎有線廣播〉，《人民日報》1964 年 4 月 25 日，第 4 版。

<sup>99</sup>Huang, N. (2013). Listening to films: Politics of the auditory in 1970s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7(3), 187-206.

<sup>100</sup>李成：〈毛澤東的媒體功能觀及其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 年第 12 期，頁 5-14。

## 論戰的激情：紅衛兵一代對九評的記憶

以 1957 年反右為起點，廬山會議，三年大饑荒，階級鬥爭觀點不斷在黨內和社會上強化。1962 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堅持「反修防修」戰略，指導中蘇論戰和在全國城鄉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兩件事相互推定和作用，使毛的思想進一步向「左」，為文革的發動做了思想輿論準備。<sup>101</sup>1964 年毛澤東又提出「黨內走資派」的概念。鑒於中蘇兩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產生分歧，九評要旨在於深度闡釋國際「反修」，國內「防修」的必要性，從而防止美國的和平革命策略。論戰使毛澤東確信蘇聯修正主義已經上臺，中國也有可能出現修正主義，從而使自己親手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顏色。因此，中國的反修防修鬥爭十分迫切。這就需要教育中國的年輕一代成為革命接班人，這裡面包含泛指的年輕一代對老一代革命者的接班，另一個特指是毛澤東作為黨的最高領袖的接班人問題。<sup>102</sup>

中共建政後前十七年的學校教育，形塑了紅衛兵一代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黨和毛主席的教導是這代人行為和思考的唯一依據，並在未來的革命風暴面前躍躍欲試。學習九評，接受接班人教育，進行憶苦思甜，參與四清等，不斷的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運動，對這代人的思想造成深刻影響。<sup>103</sup>這一時期的中學和大學，政治氛圍日益緊迫。北京 101 中學是高幹子弟雲集的寄宿制學校，1950-1960 年代學生日常活動軍事化和革命化，革命氣氛比其他學校更加濃厚：「先輩浴血奮戰打下來的江山，靠我們這一代來捍衛，來建設；先輩未實現的共產

<sup>101</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頁 2275。

<sup>102</sup>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 年版，頁 58。

<sup>103</sup>唐燦 米鶴都 陸建華 印紅標：〈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一項關於紅衛兵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軌跡的研究〉，《青年研究》1986 年第 11 期，頁 23。

主義理想，靠我們這一代去實現！」<sup>104</sup> 1963-1967 年就讀於復旦大學的安文江和武漢電力學院的徐海亮都感到自 1957 年反右以後「學校像教堂，老師像牧師，學生像羔羊」，一代人的中學時代是「思想被強制，天性被壓抑，個性被扭曲，靈魂被淨化的自得其樂的痛苦時期」。<sup>105</sup>

在持續的灌輸和教育下，紅衛兵一代中革命情懷和接班人意識最強烈的高幹子弟，曾經慨歎沒有生在大革命的時代，錯失建功良機。當中蘇論戰爆發後，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織，讓他們幾乎透不過氣來。<sup>106</sup>陳佩華的研究表明青春期的政治社會化，使中蘇論戰時期的青年人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政治教導，又以不同的方式向黨表達忠心。<sup>107</sup>同時，自 1950 年韓戰爆發以來，教科書開始出現文革時期隨處可見的攻擊性語言，大躍進後，教材中的語言轉變為對敵對陣營和叛離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的辱罵，學生長期浸淫並儲存了大量「煽情式謾罵和政治意味濃厚」的語言，被「灌足了火藥」，隨時可以用這些暴力語言，宣洩他們對「階級敵人」的仇恨。<sup>108</sup>還有，反右運動中作為右派分子「污蔑蘇聯」，「反對向蘇聯學習」和「挑撥中蘇關係」等罪證，<sup>109</sup>暴露 1950 年代以來社會上存在對中蘇關係的異議，這也是九評能夠激發紅衛兵一代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仇恨修正主義的社會土壤。

---

<sup>104</sup> 肖文：〈文革回憶〉，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8 年，頁 73-74。

<sup>105</sup>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編：《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 年紀實》（第 5 集），北京：北嶽文藝出版社 1989 年，頁 301。

徐海亮：〈我的文革見聞——另一類學生與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 522 期，2006 年 8 月 23 日，<http://www.cnd.org/CR/ZK06/cr356.gb.html>，2016 年 11 月 27 日登入。

<sup>106</sup> 徐友漁：《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我在一九六六》，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8 年，頁 20。

<sup>107</sup> 陳佩華著：《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頁 66-89。

<sup>108</sup> 餘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 年，頁 122。

<sup>109</sup> 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頁 27-28。

九評對於形塑紅衛兵一代的國際觀影響深遠。國家之間，非友即敵。1964年，高幹子弟周七月（1947-）在北京市外語學校上高一，開學半月下鄉勞動，晚上一起學習九評，念、讀、談感受。身處培養外交儲備人才的學校，學生都自居為革命接班人，天天發自肺腑地學習九評。討論中，周七月提出勞動艱苦沒關係，只要晚上能夠有條件洗澡和正常如廁，被批為修正主義。勞動結束後，當時的政治老師姚淑奇在全校組織長達半個學期的討論，題目是「是要做紅色接班人還是做紅色翻譯？」周七月被點名發言，他認為作為職業的翻譯跟作為使命的革命接班人不矛盾。全年級發起「跟資產階級爭奪周七月」新運動，正是通過學習九評運動，周七月形成了「面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我們要擔負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地位，我們要眼觀全球，去解放亞非拉」的觀念。<sup>110</sup>學習九評運動，激起他們強烈的民族主義，認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轉到東方，中國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才是國際共運的導師和「老大」<sup>111</sup>。中共在學習九評運動中實施的這種階級教育和接班人教育，實際上形塑了這代人的國際觀。

受九評影響最深的主要是四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或一部分高中生，其中高幹子弟革命情懷和接班人意識最強烈。1950年代出生的學生還太小，絕大部分到文革開始後還讀不大懂這類政論文章。

紅衛兵一代中因年齡、階層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對九評內容的記憶及其影響相異。出身紅色家庭的徐海亮（1944-）1967年畢業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他從叔父家帶回斯特朗的《史達林時代》，研讀九評系列文章，關注文藝與理論

---

<sup>110</sup>引自筆者對被訪者 S15-ZQY 的訪談記錄，北京，2015年3月13日。

<sup>111</sup>王復興：《搶救記憶：一個北大學生的文革回憶錄》，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6年，頁4。

界的大批判，「與同學相比，我是極為自覺自願和全力投入，爬上批判修正主義的文化大革命戰車。」<sup>112</sup>他對第九評印象最深，認為它激發了一代大學生政治熱情，紅衛兵文風模仿九評；接班人五條，成為大學生追求和衡量自己的目標，不管出身好壞，有一個世界革命的使命感；第九評中的專政十五條經驗，成為他們看外面社會，政治，文革熱身的條例；「兩位主播義正詞嚴，字正腔圓，抓緊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心。我們在結束曲國際歌的節奏中，含淚走向教室。」<sup>113</sup>

北京高幹子弟秦曉（1947-）記憶中 1963 年有兩件大事，除了學雷鋒，就是中蘇關係破裂和中蘇論戰。他意識到學習九評非常重要，自己受到極大的激勵。他與全家收聽九評：「播音員夏青和齊越，鏗鏘有力地說：你們撕毀的合同不是幾個、幾十個，是幾百個……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洗不盡對中國人民欠下來的債！那語調，那每一句話，讓人聽著都特別激動，特能激起義憤，真的感覺是出了心中的大氣了。」<sup>114</sup>

大陸自由派知識份子代表陳子明（1952-2014）在 1963-1965 年「反修」運動和學雷鋒時是北京小學生，深受「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民族自豪感和「解放全人類」的國際主義的鼓舞，嚮往「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人民服務」的道德情操。<sup>115</sup>報紙整版的論戰文章和夏青、葛蘭抑揚頓挫令人亢奮的播音，令上海小學生尤澤勇（1950-）記憶猶新。文革開始後他成為「逍遙

---

<sup>112</sup>徐海亮：〈我的文革見聞——另一類學生與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 522 期，2006 年 8 月 23 日，<http://www.cnd.org/CR/ZK06/cr356.gb.html>，2016 年 11 月 27 日登入。

<sup>113</sup>引自筆者對徐海亮的微信訪談，武漢-上海，2016 年 8 月 17 日。

<sup>114</sup>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 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口述歷史之一》，香港：中國書局有限公司 2011 年，頁 97。

<sup>115</sup>陳子明：《荊棘路、獨立路——陳子明自述》，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頁 9-10。

派」，因〈二評〉〈七評〉引用了「劉少奇同志」的話，存在「理論錯誤」而遭禁售，而他自己「閒得無聊」，由於「禁文的吸引力」，便動手抄寫這兩篇超過 3 萬字的文章，並裝訂成冊，還做上封面，「足見當年論戰的氣場對我潛在的影響之大。」<sup>116</sup>

小學生也被學校組織收聽九評廣播，讀九評文章，甚至發明了與赫魯雪夫有關的遊戲，進行教育。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上海小學生肖巍（1954-）認為九評間接影響自己的興趣和職業：「我全文抄過中蘇論戰的九封公開信，九評提出的概念和文筆都非常好，那時看得非常入迷。它對我有間接影響，我對政治學、政治理論、政治方法的興趣，從大學一直保持到現在，而且我現在也是政治課的教師。」<sup>117</sup>西安小學生曹永明（1951-）記得「學校還組織學生到革命公園玩「抓壞蛋」的遊戲，我當時是少先隊的大隊宣傳委員，大隊輔導員讓我事先繪製了幾張「壞蛋」的漫畫像，藏匿在隱密處供同學們搜尋，其中一張就是赫魯雪夫。」<sup>118</sup>學習中蘇論戰的連篇巨文和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對學生來說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次練兵和前奏。<sup>119</sup>

九評對紅衛兵一代的影響在文革時期有一個發酵的過程，革命高潮過後，有些人通過閱讀《新階級》，《史達林時代》和《赫魯雪夫主義》等開始反思文革。首先，由於學習九評，文革之初「五一六通知」公佈後，有些人很快領會毛主席

---

<sup>116</sup>尤澤勇：〈荒誕歲月的荒廢青春〉，載王曉純 吳晚雲編：《大學生 GE 閱讀》（第 11 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014 年，頁 298-299。

<sup>117</sup>引自筆者對被訪者 S14-XW 的訪談記錄，上海，2014 年 12 月 18 日。

<sup>118</sup>曹永明：〈中蘇四十年間的是與非〉，[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ca72f0102vl60.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ca72f0102vl60.html)，2015 年 6 月 9 日。

<sup>119</sup>岑穎義編著：《赤子：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回憶》，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6 年，頁 20-23。

王復興著：《搶救記憶——一個北大學生的文革回憶錄》，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6 年，頁 4-6。

提出的要特別警惕「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並開始琢磨誰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sup>120</sup>其次，革命高潮過後，有些人通過閱讀《新階級》和《史達林時代》等書開始反思文革。廣西小學生秦暉（1953-）對這些論戰文章尚未深刻理解，但他懂得「特權階層」這個說法。他猜測當時許多人也大概懂得這個提法。文革伊始，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人立即將「特權階層」與「走資派」對等起來，而〈九評〉中列舉的蘇聯「特權階層」的種種惡行，也立即被人們拿來對照現實。<sup>121</sup>歷史學者卜偉華（1950-）1963年就讀清華附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九評〉，一方面，播音員水準都很高，義正辭嚴，慷慨激昂，真理在握；另一方面，正是因為〈三評〉痛批南斯拉夫，〈九評〉大談「特權階層」，這些概念和困惑埋在他心裡，1967-1968年閱讀《新階級》和《史達林時代》之後，他發現「新階級」與中國的「特權階層」有相似之處，從史達林時代大清洗聯想到當時「打倒」一部分人，懷疑黨和毛主席是否一貫正確。<sup>122</sup>文史學者丁東（1951-）1964年入讀北京師大一附中，67、68兩年，擔任學校革委會小報編輯，宣傳毛主席最新指示，成為熟練編輯，但知識儲備不行，「因為接觸的全是兩報一刊社論之類的東西，寫文章也是學戚本禹、姚文元的口氣」。文革開始後讀到錫蘭共產黨領導人古納瓦達納寫的《赫魯雪夫主義》這本書，書中講述蘇共的兩次權力鬥爭，使他「第一次知道共產黨上層是這樣一種鬥法，赫魯雪夫捧史達林和林彪捧毛澤東很相似」。<sup>123</sup>

1970年代公共生活中，民眾「收聽」電視和電影，政治資訊透過聲音媒體進入日常生活中，逆聽(listening against)和傾聽(listening in)同時存在。<sup>124</sup>出身舊

<sup>120</sup>王復興：《搶救記憶：一個北大學生的文革回憶錄》，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6 年，頁 4-6。

<sup>121</sup>秦暉：〈沉重的浪漫：我的紅衛兵時代〉，載林賢治主編：《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廣州：花城出版社 2010 年，頁 287。

<sup>122</sup>引自筆者對被訪者 S16-BWH 的訪談記錄，北京，2015 年 3 月 15 日。

<sup>123</sup>引自筆者對被訪者 S7-DD 的訪談記錄，上海，2015 年 1 月 10 日。

<sup>124</sup>Huang, N. (2013). Listening to films: Politics of the auditory in 1970s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7(3),

式家庭，且有海外關係的熊景明（1943-）1964 年就讀於雲南大學：全校師生坐在大操場的水泥地上，聞著學校食堂廚房裡水煮茄子和捲心菜令人倒胃的氣味，聽央廣播出九評<sup>125</sup>：「那兩個播音員裝腔作勢，虛偽又凶巴巴的聲音令我噁心死了。」她認為自己覺悟較早，廣播員試圖告訴聽眾他們是黨和國家的聲音代表，但她聽到的卻是蠻不講理和粗痞：「他們的聲音有感染力，令人信服，絕對不是事實。那只喇叭吹出來的調子讓普通人恐懼，讓『階級敵人』顫抖。」<sup>126</sup>1963 年進入中文系就讀的工程師子弟康正果（1944-）也發現：從學習九評尤其是第九評，陝西師範大學的學生被拖入一場局部整人的運動。班上每天大會小會，每個人必須向黨交心，進行思想檢討。目睹成分不好或表現較差的同學在討論會上作踐自己詆毀自己的家庭，康正果感到這些交心表演噁心透頂，所以始終保持沉默。<sup>127</sup>

九評的傳播力度和影響力地域差異明顯。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學習力度無疑較強。1960 年進入清華大學的孫怒濤承認階級鬥爭是大學生活的一門主課，每篇九評文章發表，學校總要組織大家準時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並組織學習和討論，以激發對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仇恨，堅定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第九評發表以後，學校組織了一次為期好幾個月的學九評運動。<sup>128</sup>

內地基層對九評的重視程度亦有差別。河南省禹縣人民政府機關每週二和五下午都組織學習九評。學習方法是一人念，大家聽，之後討論，寫心得體

---

187-206.

<sup>125</sup>熊景明：《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 年，頁 163。

<sup>126</sup>引自筆者對熊景明的微信訪談，香港-上海，2016 年 8 月 17 日。

<sup>127</sup>康正果：《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1949-2003）》，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頁 100。

<sup>128</sup>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3，頁 364-365。

會。下次例會互相學習，一起評議，共同提高。好的心得體會，會被登在機關《學習園地》。九評給政府辦公室文書留下的記憶是：毛主席的秀才們「舞文弄墨，數黑論黃，引經據典，落筆萬言，或直擊要害，或旁敲側擊，嬉笑怒罵，洋洋灑灑，把蘇修批駁得體無完膚。」筆桿子與金嗓子珠聯璧合，讓人聽得熱血沸騰，真理在手。<sup>129</sup>在山東省平度縣的廣播電視志所記錄的「大事記」中，1963 和 1964 兩年只提到縣廣播站「廣泛深入地宣傳雷鋒同志的模範事蹟」和「廣泛深入地開展宣傳學習人民解放軍活動」，突出宣傳「黨的好幹部焦裕祿、南京路上好八連和王傑等先進典型，隻字未提九評。<sup>130</sup>對中國農村而言，如果居民點房頂上的廣播喇叭每天重複同一個調子，其作用就僅限於報時。<sup>131</sup>

而同期，越南河內部分群眾積極支援中共。他們非常關心論戰，向駐越中國工作人員索要中共的論戰文章，「每發表一篇文章，就似乎全世界都在傾聽，播音員穩重，深沉，雄辯，真理在握的聲音，令人們的耳朵不能不傾聽，神經不能不緊繃，靈魂不能不顫動，」有越友認為九評等文章必將和馬列經典著作一樣，成為國際共運中的經典著作。<sup>132</sup>

**文革預演：學習九評運動中清華學生孫怒濤的經歷。**

---

<sup>129</sup>董振寅：《憶九評·我們一代人的經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頁 161-162。

<sup>130</sup>《平度市廣播電視志》編撰委員會編：《平度市廣播電視志（1950-2004）》，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05 年，頁 9 和 73。

<sup>131</sup>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5 年，69 頁。

<sup>132</sup>1962-1964 年，時任人民出版社編輯的安若女士被國家對外文委派往越南工作，協助出版《胡志明選集》中文版等編輯出版事宜，同時兼任中國援越文教專家組組長。她幫助出版了當時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南方來信》一書上下集。當時中國剛經歷大饑荒，國際上正處在中蘇論戰時期。安若用日記記錄下她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在越南的親歷與所想。其女整理出一部《越南日記》。從安女士的日記可以看出越共中央與河內群眾對論戰的不同態度。參見汪向東：〈母親的“越南日記”〉，《中華讀書報》2008 年 10 月 8 日，第 3 版。

1964年夏天，清華大學開始在學生中開展學習九評運動。運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討論，提高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認識與覺悟。班上的黨員和絕大多數同學認為資產階級挑起階級鬥爭，無產階級不得不應戰。孫認為階級鬥爭源於階級壓迫和反抗。大家對他的說法進行了爭論。第二階段學校短期停課，對照革命接班人五項標準，集中清理自己在前幾年，尤其是大饑荒中時期的思想認識。當發現學生基本談正面思想，自我檢查皆雞毛蒜皮時，黨團幹部鼓勵大家向黨交心，宣稱講出來，問題就解決了一半，甚至嚴肅中帶些警告意味地說這是對黨和革命是否忠誠的一次嚴峻考驗。

受此鼓勵，孫試圖在發言中有所新意，舉兩例說明大躍進鋼鐵生產指標的隨意性和大饑荒時期浙江農民經歷的饑餓。二者皆為道聽塗說所得。黨團組織對此發言高度重視，幹部輪番啟發他說出所有曾經聽到的、看到的、一閃念想過的，與黨的政策不符合的東西。幾番下來，孫已百口莫辯：「談著談著，那些本來不是我的思想，卻被兜來兜去兜了進去，慢慢地似乎變成了我的思想。」最終，他成為學習九評中暴露出嚴重政治問題的「反面教員」。他坦言九評學習中的這幾句話，影響了他一生：「我從一個受組織信任、培養到需要組織說明；從優質生變為差質生；從春風得意到坎坷曲折，我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對我在文革中的表現也有直接的影響。」<sup>133</sup>筆者今年追問這種影響究竟指什麼，孫答覆九評學習不僅對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有直接影響，對清華文革也有一定的間接影響。他一心想在文革中好好表現，挽回在九評學習中給組織留下的不良影響，爭取文革後入黨，並在畢業鑒定中有良好的評語；另外，儘

---

<sup>133</sup>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3，頁 364-371。

管文革初期他是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委員，但最終與沈如槐等聯合成立 414，形成造反派分裂。<sup>134</sup> 對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化的社會化過程，」如學習九評運動以及與之相輔的 1960 年代學校中的小組學習，階級教育，模範教育等形塑了這代人的政治行動主義。<sup>135</sup>

事實上，1949-1978 年間，「反動學生」一詞常見於教育系統的內部通報，但只是在 1963-1966 年「清理反動學生」運動中，真正作為政治帽子和處分大學生的一個正式案由。1964 年清理「反動學生」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包括北京、上海、廣東、廣西、四川、河南、河北和安徽等省市）。<sup>136</sup> 同樣，在陝西，九評發表後，1964 年 7 月 16 日省委發出《關於立即組織幹部學習「九評」的通知》，西北農業大學黨委根據這個通知的精神，組織教授、幹部和學生進行學習和討論。在學習過程中，對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學生的生活作風與思想認識問題，上綱上線，對其進行批判，迫使一些被「重點幫助」的「問題學生」寫書面檢查。運動後期，對參加九評學習的學生寫了鑒定材料，有的學生還受到處分。<sup>137</sup>

九評將培養和造就革命接班人問題，提到「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及其重大的問題」<sup>138</sup> 的高度，在學校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1964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改進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認為在爭奪青年一代的鬥爭中，政治理論課的根本任務「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

---

<sup>134</sup>引自筆者對孫怒濤先生的郵件訪談，2017 年 2 月 3 日。

<sup>135</sup>Chan, 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52-123.

<sup>136</sup>王學泰：〈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動學生”事件〉，《炎黃春秋》，2009 年第 4 期，頁 60。

<sup>137</sup>關聯芳：〈九評學習材料檔案的燒毀〉，《西北農業大學校史》，1986 年，頁 126。

<sup>138</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 1977 年版，頁 513。

思想武裝青年，向他們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培養堅強的革命接班人」；改進課程和教材，政治理論課「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標，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最根本的任務，把毛主席著作最為最基本的教材」；同時要求教師隊伍必須革命化，同時加強學校中黨的領導。<sup>139</sup>學校的螺絲越擰越緊，為文革中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文攻武鬥的爆發埋下伏筆。

### 視聽暴力：九評的文化內涵及其影響

毛時代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植根於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革命的法則。國內階級鬥爭和國外敵我鬥爭中使用暴力符號，包括長篇累牘的暴力語言，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從早到晚的關於革命形勢和動態的廣播和高音喇叭，也具有天然的合法性。1949年以後中共依靠暴力、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建構的合法性，一直維繫到1971年林彪事件。

暴力並不僅限於身體。本文所指的視聽暴力首先指一種符號暴力，指通過紙媒上的論戰文章、廣播和高音喇叭等媒體，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向一定社會階層和群體強加某種觀點和價值。這種符號暴力不易察覺，民眾下意識地被勸說接受作為正統。其次，視聽暴力是階層化的。出身軍人、幹部、工農階層的人，更容易接受黨媒的宣傳；知識份子和幹部階層，以及被打倒的階層，同樣的文字和聲音，只會讓他們感到恐懼和威脅。

### 視聽暴力

相對於常規暴力（normative violence），九評的視聽暴力是一種「符號暴力

---

<sup>139</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188-195。

(symbolic violence)」。言辭的力量，指令的威力，以及能夠下達指令並創立秩序的言辭的力量，源於民眾對講話者及其言辭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深信不疑，而言辭本身並不生產這種信仰。<sup>140</sup>首先，九評和各類評論員文章，在兩報一刊及各地黨報系統全文轉載，造成視覺暴力：這些大塊頭的文章長期佔據各種報紙的頭版頭條；單位組織的各類有關九評的集體學習，充斥民眾工作和業餘時間的視聽空間。九評和各類評論員文章，由央廣和各地廣播電臺廣播，導致聽覺暴力。大字報、宣傳畫的視覺暴力都展示了國家無所不在的浸潤和佔領。<sup>141</sup>其次，這種國家意義上的視聽霸權與想像中的「聲音主權」相連，聲音可以是承諾，也可以是威脅，可以構建「聲音共同體」，表明聲音在民族認同和地方政治中具有特殊的效用。<sup>142</sup>

視聽暴力的共同載體是語言暴力，語言暴力集中反映「九評體」語言及其特點。這類暴力話語旨在表達一種蔑視、極端厭惡和仇視的敵對態度和情緒。對文革中紅透半邊天的一些動詞、形容詞、副詞這類慣用語的分析，同樣表明革命話語的「政治唯美主義審美觀」。<sup>143</sup>與大字報和諸多社論一樣，「九評體」及後來的「文革體」在暴力語言向暴力行為轉化過程中，在語言陣地上打了頭炮，其影響至今明顯。1998年，中國舉辦中蘇論戰問題討論會，與會者認為九評「文字漂亮，氣勢磅礴，但是文風也有問題，很多地方不嚴肅。不實事求

---

<sup>140</sup>Bourdieu, P. (1979). Symbolic power.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4(13-14), 77-85.

<sup>141</sup>濫觴於 1957 年反右運動的大字報也是毛時代視覺暴力的一個重要來源。因為數量巨大，上海和廣東農村都宣稱 1958 年底前已貼出一億張；分佈在機關、工廠和學校，城市和農村廣大範圍；從黨內整風到對敵鬥爭，「放」、「燒」、「自焚」等涉及社會各個群體之間，各種社會成員之間，以至於大字報無處可貼，很多大字報根本無法閱讀，人們在單位行走困難，紙張和漿糊告急。參見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頁 38-104。

<sup>142</sup>Sykes, J. (2016). Sound as Promise and Threat: Drumming,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the British Raj in Colonial Ceylon. In Biddle, Ian and Kirsten Gibson, eds., *Cultural Histories of Noise, Sound and Listening in Europe, 1300-1918*. Ashgate Publishing. 127-152.

<sup>143</sup>孫沛東：《時尚與政治：廣東民眾日常著裝時尚（1966-1976）》，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頁 111。

事。那種搞『言論對照』<sup>144</sup>以及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和無限上綱等做法，到了文革時期就風靡全國了。」<sup>145</sup>

旅居澳洲的紅衛兵一代陳向陽（1954-），於 2016 年在當地的華文報紙文革專欄撰文討論語言暴力對這代人的影響。「他們使用過革命語言，至少在每個人都必須表態的政治學習中模仿過。這種語言就是對敵人的戰鬥語言，氣勢洶洶，不講道理，不顧邏輯，不容質疑。有些人曾滿嘴髒話，張口就來，說者、聽者都習以為常。」<sup>146</sup>目前大陸的一些網路辯論，實際上仍舊複製和沿襲著九評和文革的辯論模式。

## 思想暴力

思想暴力體現在媒體動員模式、人的異化及其精神遺毒。

1949 年以後，九評文章和學習九評運動是最靠近文革的一次輿論演練，這種媒體總動員模式業已純熟。與 1951 年全國批判《武訓傳》一樣，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人民日報》等連續發表批判文章，有關人士的檢討和反思，群眾集會和讀者來信等，「聲勢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顯得十分突出。」批武訓實際上樹立了一個模式，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紙媒如何緊跟運動，貫徹和宣傳黨的最新精神，都有了有章可循的先例。<sup>147</sup>

人的異化包含很多層面，這裡只討論由這種思想暴力滋生的文字獄和檢討體。1949 年以來的文字獄，從 1950 年批電影《武訓傳》到 1960 年代批《三家村》和《海瑞罷官》等，因思想犯罪的人不勝枚舉。根據《聶紺弩刑事檔案》，

---

<sup>144</sup>「言論對照」，指九評援引馬恩列的言論，對照赫魯雪夫的言論，以此證明赫氏背離正統，搞了修正。這種言論對照在文革中是大批判慣用之法，當時出版了無數 XXX 反革命言論摘抄：一邊是毛主席語錄，一邊是這些反革命的言論。

<sup>145</sup>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頁 910。

<sup>146</sup>陳向陽曾經是北京知青，當過七年工人，78 級北京大學地理系本科。1984 年之後在澳洲求學並工作定居。參見陳向陽：〈我們，「壞人老了」的一代〉，《大洋日報》2016 年 8 月 9 日，第 12 版。

<sup>147</sup>袁鷹：《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6 年，頁 77。

在給聶定下寫詩犯下「惡攻罪」前，有關領導指示讓舉報人提供詩稿，並詳細注釋聶詩反動之處，以重新闡釋詩句的方式，檢舉聶的罪行。從舉報人解詩可以看出，羅織罪名的方法與封建時代並無二致。<sup>148</sup>「青眼高歌望吾子，紅心大幹管他媽」，映照當時粗鄙的政治話語。

制度化的檢討體文風盛行，將普通民眾置於自賤自辱的無恥中。降低自我認同，減損社會認同，是個體靈魂的巴士底獄。「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查，請不完的罪，」反映出毛時代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普通人，都必須面對檢討。<sup>149</sup>毛澤東宣導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自我批評正式進入公共空間，由黨內走向黨外；從反右到文革，形成一整套檢討書的結構模式。<sup>150</sup>自我檢討、內部檢討、公開檢討等一系列檢討技術，使檢討成為一門生存學問。作為公共空間裡的一種私人懺悔，檢討是列寧政黨維護秩序、控制思想的一種文化手段。「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sup>151</sup>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公開懺悔是「摧殘個人尊嚴的文字酷刑，是培訓無恥人格的造句練習，是迫使檢討者把自己的小辮子任人亂揪的精神折磨，是指令一個人按照上級的批示去罵自己的話語暴政，是拿起筆桿子打自己嘴巴子的糞便作文。」<sup>152</sup>

人的異化也體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身份的流動性。文革開始後，在西北農業大學學習九評運動中受到迫害的問題學生，提出清理九評學習鑒定材料，於 1967 年 1 月 10 日，強行燒毀九評學習檔案材料，並在燒毀過程中，強迫學校黨委領導下跪請罪。<sup>153</sup>1960 年代「三家村」雜文〈「偉大的空

<sup>148</sup>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9 年，頁 65-80。

<sup>149</sup>史寶編著：《文革中的檢討書》，臺北：時英出版社 2011 年，頁 9。

<sup>150</sup>表態認罪；挖掘根源，具體剖析；上綱上線，為錯誤定性；決心學習改造。參見王偉：〈檢討書：公共空間裡的私人懺悔（1949-1976）〉，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2 年，頁 11-31。

<sup>151</sup>侯井天主編：《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注解集評》，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頁 2。

<sup>152</sup>康正果：《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1949-2003）》，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頁 102。

<sup>153</sup>關聯芳：〈九評學習材料檔案的燒毀〉，《西北農業大學校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頁 127。

話」)與毛澤東的〈反對黨八股〉遙相呼應，甚至吳南星<sup>154</sup>對愛講空話的人的建議都模仿毛澤東；<sup>155</sup>以明史專家身份，1949年11月當選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奉旨」創作《海瑞罷官》，<sup>156</sup>1959年6月至9月發表〈海瑞罵皇帝〉和〈論海瑞〉等文章，1961年《海瑞罷官》發表和上演，1961-1964參與「三家村筍記」寫作。但文革前夕，以姚文元為首的黨內幹部對《三家村筍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到了文革之後，為《海瑞罷官》平反的文章以同樣的「文革體」宣稱：「冤獄就是你們這些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製造的，今天我們就是要平冤獄，包括你姚文元《評新編》造成的以批《海瑞罷官》為中心的文字獄，都必須一個一個地清算，一個一個地平反。冤獄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sup>157</sup>由此可見，任何政黨，如果不能形成制度化的通道，以制度化的方式，公開處理黨內所謂路線鬥爭，黨同伐異、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就不會被打破，政治鬥爭永遠是一場沒有妥協和協商的零和遊戲，結局永遠是雙輸。一句話，「沒有民主憲政，豈能告別政治生活的惡夢」。<sup>158</sup>

「九評體」作為精神遺毒至今猶存。自1930年代延安時期開始，尤其是1949年以後，透過文字和聲音的力量，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一種「不透明性」，<sup>159</sup>陰謀論在全黨全國和普通民眾中盛行並蔓延，「真相焦慮症」被建構出

---

<sup>154</sup> 吳南星是集體筆名，「吳」指吳晗；「南」指馬南邨，即鄧拓；「星」則指繁星，即廖沫沙。他們用這個名字出版了《三家村筍記》。

<sup>155</sup> 參見吳南星：〈“偉大的空話”〉，載吳南星：《三家村筍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7-9頁。

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毛澤東作《反對黨八股》報告，羅列「黨八股」的八大罪狀，並指其必須被徹底拋棄。參見毛澤東：《反對黨八股》，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頁1-25。

<sup>156</sup> 1959年4月毛澤東不滿大躍進期間幹部隱瞞資料，號召他們學習海瑞的直言精神，講真話。毛的一個秘書打電話給吳晗，讓他撰文介紹海瑞其人其行。吳晗1959年6月1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海瑞罵皇帝》。參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關心譯，唐少傑校，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頁6。

<sup>157</sup> 蘇雙碧：〈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光明日報》1978年11月15日，第3版。

<sup>158</sup> 丁東：〈“文革中的山西”序〉，載石名崗執筆：《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親歷者的記憶與反思》，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頁4。

<sup>159</sup> 文中語言的“不透明性”，“對歷史的暴力”的提法得益於哈佛大學東亞系田曉菲教授2016-2017學

來。從 1961-1964 年北京市委機關報《前線》和《北京日報》連續刊登《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sup>160</sup>到 1963-1964 年中蘇論戰九評的出臺，再到 1965 年底，以姚文元為首，隨後全民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sup>161</sup>和「三家村」<sup>162</sup>，所有這些對外論戰和對內撻伐的共同點是：對人不對事，事實並不一定最重要；都宣稱按照馬恩列斯的教導，遵照毛澤東思想和精神；都承諾並告誡讀者和聽眾：存在一個騙局，民眾被騙，民眾讀到或聽到的內容將說明其揭開迷霧，撕下畫皮，最終還歷史以真相。同時，鼓勵讀者或聽眾，根據作者引導，對作者所批評的人和事，進行新的解讀和聯想，由此在社會上產生一種普遍的群眾性解讀。這種「深度解讀/解毒」都指向一種壞的、有毒的、惡的東西；這些東西在隱藏中，尚未被大眾覺察。在不同時期黨和國家的最新革命精神指引下，全民族都在追尋一種意義，再加上歷次群眾運動所積累的社會矛盾，中國社會掀起一股又一股「全民偵探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順勢而為，從而將一種文學批評、政治論戰或政論文章，演變成一種政治運動的先聲。1976 年以後所有的相關平反文章，<sup>163</sup>仍舊沿用了九評以來的一貫的文風；這種文體、修辭和邏輯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 歷史暴力

---

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與藝術”課程上所授內容及討論。特此說明並致謝。

<sup>160</sup>吳南星：《三家村劄記·“偉大的空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頁 7-9。

吳南星：《三家村劄記 專治“健忘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頁 60-62。

鄧拓：《燕山夜話 他諷刺你了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頁 421-423。

<sup>161</sup>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學術月刊》1965 年第 12 期，頁 1-11。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1965 年 11 月 10 日，第 1 版。

<sup>162</sup>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文學評論》，1966 年第 3 期，頁 8-22。

<sup>163</sup>蘇雙碧：〈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光明日報》1978 年 11 月 15 日，第 3 版。

新華社：〈一個驚心動魄的政治大陰謀—揭露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黑文出籠的經過〉〉，1979 年 1 月 6 日，第 3 版。

黎澍：〈一個圍獵知識份子的大陰謀—評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評〉，《人民日報》1979 年 2 月 1 日，第 12 版。

九評實際上是對中蘇交惡這段歷史的一種暴力。「九評體」屬於八股文章這個判斷，出自 1963 年 6 月「反修檔起草小組」對陳伯達組織的《紅旗》雜誌和中宣部等人馬完成的〈中共中央對蘇中中央 3 月 30 日來信的答覆〉初稿的評價，此文後來定稿時題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該小組認為「這樣的八股文章，老祖宗講什麼，赫魯雪夫講什麼，相比對照，不一致或有差異，就是修正主義，完全沒有聯繫實際」。閻明復看到陳伯達小組逐段摘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等，《紅旗》雜誌社大會議室桌子上、窗臺、茶几和地板上到處堆滿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sup>164</sup>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聶紺弩當時就認為，九評只是摘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的一些詞句，世易時移，列寧的觀點無助於解決當下的新問題。<sup>165</sup>

以下舉兩例分析九評對歷史的暴力。〈三評〉圍繞南斯拉夫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展開。文章從經濟、政治、外交等方面論證南斯拉夫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南斯拉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sup>166</sup>〈三評〉的寫法是「南斯拉夫黨和國家已經變質」這個結論在先，之後再搜集資料進行論證。<sup>167</sup>通過錯誤地勾畫「資本主義復辟」的基本輪廓，使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有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的思想進一步向「左」發展。親歷者吳江認為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根本性的錯誤。斯達林提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的典型，赫魯雪夫把它平反了，並親自登門道歉，中共

---

<sup>164</sup>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20。

<sup>165</sup>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9 年，頁 120。

<sup>166</sup>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 151。

<sup>167</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 4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頁 1289。

卻出來維護斯達林的無理判決。<sup>168</sup>

〈六評〉聚焦社會主義國家是否能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提出戰爭不可避免。列寧和史達林的和平共處政策強調，和平共處靠鬥爭得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列寧對外政策的根本原則；被壓迫階級/民族同壓迫階級/民族不能和平共處，因此，蘇共藉口「和平共處」，鼓吹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全面合作」，這是「為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大開方便之門，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的要求。」<sup>169</sup>事實上，以暴力奪權為主，議會鬥爭為輔的策略，並不符合北美西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因此也遭到歐美共產黨的抗拒。<sup>170</sup>1969年珍寶島衝突爆發，中蘇處敵對狀態，中美關係反而開始正常化，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鄧小平承認，在中蘇論戰中雙方都不完全尊重事實。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激烈論爭。作為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鄧認為自己「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但是，「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sup>171</sup>其實，「鄧小平宣導的改革開放，很多都是當年中共所批判的『修正主義』，而且比那些所謂的『修正主義』走得還遠。」<sup>172</sup>這一時期央廣的政治宣傳給一些越南幹部和知識份子留下不好的印象。60年代時中蘇都在越南做宣傳。越南人聽得懂蘇聯人的宣傳，卻無法理解中國人的宣傳。因為蘇聯的宣傳中談到戰爭與和平，

<sup>168</sup>吳江：〈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記略〉，《炎黃春秋》2005年第5期，頁46-48。

<sup>169</sup>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蘇論戰文獻：“九評”及其他》，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頁316。

<sup>170</sup>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頁408。

<sup>171</sup>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91。

<sup>172</sup>李洪林：〈從山雨欲來到浩劫晚鐘：文化大革命簡述〉，香港：《當代中國研究》2016年第2期，頁37。

建設等等還有人性和理性。與中國一樣，當時越南也到處是高音喇叭，每天固定播放中國北京電臺的廣播。越南幹部中有一個特別的詞彙，當說到某個人說話高亢武斷時，就說「他像北京電臺一樣」。<sup>173</sup>

事實上，中蘇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結構性的：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存在矛盾，意識形態的統一性無法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實行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出現利益訴求，缺乏妥協機制，因此，中蘇同盟破裂無法避免。<sup>174</sup>

誠然，靠訴諸於人們被誇大的恐慌、真實的憤懣情緒以及出於本能的偏見在政治論戰和紛爭中獲得好處的做法，並非中蘇論戰或文革所特有。<sup>175</sup> 以往帶有冷戰宣傳意味的歷史學和政治學敘述強調，美國革命與血淋淋的俄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不同，前者是一場「好的、有秩序的、有節制且成功的革命」，但實際上，它也是一場激烈的革命，諸多保皇黨人與愛國者、白人與黑人和印第安人等多個面向都爆發內部的爭鬥；種族主義、暴力、分裂以及用污言穢語辱罵、恐嚇對手這些伎倆，從美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sup>176</sup>

然而，關鍵的問題並不是歷史包含著多少黑暗，而是在於能不能吸取教訓，追求進步。時代的洪流永無止息。有的民族和國家能夠從過往中去糟存精，在時間的流裡不斷剔除制度和人性中的膿包和毒瘤，從而使社會和民眾更加清明跟自省。但在有的民族和國家，這些膿包並沒有被徹底擊穿，這類毒瘤仍舊蔓延，甚

---

<sup>173</sup>袁訓會 徐書鳴：〈程映虹：中越之間的恩怨糾葛〉，《同舟共濟》2014年第12期，頁16-19。

<sup>174</sup>沈志華 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481-482。

<sup>175</sup>「種族隔離」時代的白人至上主義；19世紀50年代本土美國人致力於控制移民入境的「一無所知運動」(Know Nothing)；尼克森的「南部戰略」(Southern strategy)也利用了南方白人選民對黑人在民權運動中所取得的成果的怨恨情緒。美國政治史上的暴力不在少數。19世紀選舉期間美國國會時有鬥毆，各大城市爆發騷亂。直至20世紀，生活在南方試圖參與選舉的黑人還會面臨三K黨以及類似群體的暴力威脅。參見 Foner E. 2016, Book review of *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 by Alan Taylo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8, p.11-12.

<sup>176</sup>Taylor, A. (2016). *American revolutions :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 (First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3-9.

至化作一種新的病毒，在街市閒談，學術辯論，學術批評，網路圍攻，外交文宣等等領域和場合，依舊為患社會。從歷史覆轍所獲得的教訓，尚未匹配所經歷的苦難，慟。

孫沛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2016-17），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2017-18）。主要研究文化大革命文化史和社會史。在《中國季刊》等期刊發表文章 20 多篇，已出版專著《時尚與政治：廣東民眾日常著裝時尚（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3）和《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2013）。